

艰苦岁月 忍辱负重 敦煌事业的带头人

孙儒们

(敦煌研究院, 甘肃 兰州 730030)

中图分类号:K828 文献标识码:A 文章编号:1000-4106(2011)03-0008-02

段先生是1946年9月到敦煌的,我比他晚一年到敦煌。我来时除了段先生外,还有霍熙亮先生、范文藻先生(后来去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)等。我是学建筑的,但我对敦煌的建筑一窍不通,对石窟艺术也是一点也不懂。我们去后是段先生给我们讲解,才使我们走进了敦煌艺术的殿堂。50年代以后的同志,差不多也都是段先生引导大家走进敦煌艺术殿堂的。

40年代到60年代这30年间,去敦煌的同志大多是搞艺术的。1958年成立了兰州艺术学院,常书鸿就去兰州,长期不在敦煌文物研究所,段文杰先生实际上就是敦煌研究的带头人。从1946年到敦煌,直到1976年,这几十年,段先生是忍辱负重、呕心沥血。这期间历次对外展览,他都参与计划和组织工作,如莫高窟第285窟、榆林窟第25窟、莫高窟第217窟等洞窟的原大复制临摹工作,都是在1976年以前完成的,而这期间,他在政治上非常坎坷。1957年反右,当时想要把他打成极右,可是又找不出证据来,没有打成,硬给他安了个什么罪名。当时他的工资降得很厉害(只有四十块钱左右的生活费),他的生活很艰苦。那时弄了个所谓“四川帮”,段文杰、史苇湘包括我和李其琼、欧阳琳等,因为都是从四川来的人,我们几个戴了帽子,他虽然没有戴帽,但也是受到冲击的人。直到60年代初,才给“四川帮”彻底平反了。

即使是挨整的那些年代,每年所里定工作计划、规划等,却又是段文杰先生来负责的。因为常书

鸿所长常年不在敦煌,当时的负责人光知道发号施令,业务方面也搞不出来,还是要老段来做具体工作。文革开始以后,又把这批人打成什么“分子”之类,段先生被下放到敦煌的农村去了,我和老伴也被扫地出门,逼迫我们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。

反右、文革都对他有很大影响,可是就在各种政治风波冲击的时期,敦煌的很多临摹和研究工作却是在这个期间做出来了,而且临摹工作的重要部分都在这个时期做出来了。那时的工作主要还是靠段先生支撑着,可以说他是忍辱负重。

从生活上看,解放前的几年间,从我1947年到敦煌直到新中国成立,没有见他添置过一件新衣。国民政府垮台之前的几年,常常没有经费。冬天房间很冷,所有搞美术的人都集中在一个房间里,生一个火炉。我们自己的房间里没有火炉,所有装水的东西,如果晚上不处理掉,第二天就会冻得硬硬的。我们睡觉时要用绳子把被子的下部扎起来,否则会透风,是很冷的。早上起来被头上都是霜。实在冷得没办法,我跟他商量学着本地人烧炕,用粪渣子、树枝等可燃的东西塞到炕洞里烧,我跟老段住隔壁,两个房间共用一个烟筒。我们是南方人,不太会烧炕,有时烧好了还可以,如没有烧好,半夜没有火了,仍非常冷;有时又烧得太热,人躺在炕上就象烙饼子一样,烫得没法睡。我们大概烧了不到一个月,因始终掌握不好,后来干脆不烧了,晚上就在办公房间炉子边看看书、画点画什么的,直到很晚才回到自己房间睡觉。那时年轻,就这样顶过来了。

收稿日期 2011-04-01

作者简介 孙儒们(1925—)男,四川省新津县人。敦煌研究院研究员,保护研究所原所长。

记得在1948年,国民党快完蛋的时候,生活很困难,没有吃的,有人建议我们养羊。后来我跟老段两人商量合买了一头母牛,这样就可以每天挤牛奶喝,改善一下生活。母牛很快就下了一头小牛,也是母牛。当时还有人羡慕我们说“母牛下母牛,三年五条牛”,但是我们没有经验,每天只让牛吃草,没有适当的饲料,牛就饿得精瘦,牛奶也少了。后来养不了了,只好把牛卖掉。卖牛的钱我请常先生在南京给我买件衣服,当时的物价飞涨,这半头牛的钱,最后只买了件衬衫。为了维持生活,当时所里好些人都养鸡养羊,养了鸡还可以吃鸡蛋。我们后来又养了羊,可以喝些羊奶。吃的菜也是自己种,我们在这里学会了劳动技能。后来文革中的困难时期,老段与他的爱人龙时英还养兔子,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。

段先生是很乐观的,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,他依然专心于壁画临摹工作。冬天天气冷无法上洞子(窟)画画,尤其是不能调颜色了,但是可以起稿,为第二年的工作作准备。每个人都有一些任务,按专题来分,如段先生他主要画供养人等,欧阳琳则是搞图案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专题。那时规定不能按原大画,因为在此前张大千临摹的办法是用纸贴在墙上起稿(当时没有像现在的涤纶薄膜之类的透明纸,张大千是从四川带来的宣纸,拿煤油浸透,还要趁煤油未干之时,贴在墙上描出底稿),对壁画的损坏很大。研究所成立后,常书鸿坚决禁止那种破坏壁画的做法,为了防止有人贴墙印稿,就规定不能用原大,总是要比原大缩小一点。临摹中不能损坏壁画,这是我们长年在敦煌工作的一个共识。记得是1954年,中央美术学院、浙江美术学院一些教师带着学生到莫高窟临摹壁画好几个月,研究所的人对这些大学的师生们都很热情,但有一天段先生发现有人在洞窟里用图钉把纸贴在墙上印稿,段先生马上制止了这种做法。这件事还报到文物局,进行了通报批评。这件事说明段先生对敦煌壁画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。

解放初期,1951年在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敦煌

展览以后,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。1952年决定搞原大复原临摹洞窟,要给人一个真实的感觉,把一个洞窟完整临摹下来,让外地的观众能看到整体。这种震撼是一个个单幅画所不能代替的。首先临摹第285窟,搞这样大型的洞窟,又不能把纸贴在墙上起稿,只好用尺子量好尺寸,按比例一点一点画,全部是这样起稿,所以这个洞窟临摹品在准确度上是有些出入的。

50年代,常先生经常不在敦煌,这里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段先生主持。第285窟搞完又去榆林窟临摹,那时是冬天,榆林窟很冷,也没有房子,段先生和男士们就到睡佛殿搭地铺。那个不算窟,实际上是一间房子,到处都是窟窿眼。从1955年开始正式临摹,直到1957年“反右”之前,在榆林窟完整临摹了榆林窟第25窟和另外一些洞窟单幅的画面。榆林窟第25窟效果还是非常好的,段先生自己临摹了南壁的巨幅观无量寿经变。

后来就是反右、大跃进、经济困难时期,直到1962年才又开始正常的工作,但是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,开始了最艰苦的日子。然而从1946年到1976年,这30年间临摹的作品是本院最好的作品,包括到现在为止,敦煌研究院拿出去搞展览的重要作品还是这一时期的临摹品。

临摹工作是很重要的,在中国古代绘画“六法”中就有“传移模写”,现在我们认识古代绘画大多是靠临摹品,比如展子虔《游春图》已经证明是唐人临摹的,但这件作品在美术史上依然有其重要的价值。在美术史上,这样的例证很多。段先生组织研究所的人画画,他自己非常注意练功,从解放前就练手,除了理解之外,功夫是很重要的,没有高超的技巧,所谓“传神”是传不出来的。常书鸿开创了敦煌艺术研究的道路,几十年来,真正走得好的还是段先生。

段先生逝世,我们作了一幅对联,以作纪念:
莫高窟里,艰难岁月,妙笔犹传艺术神韵;
鸣沙山下,辛勤耕耘,创建敦煌研究平台。